



wumeicun yanjiu

徐江 著

吴梅村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吴梅村研究

徐 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梅村研究/徐江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81064-294-4

I. 吴… II. 徐… III. 吴梅村-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035 号

WUMEICUN YANJIU

吴梅村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91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导言

上篇 悲剧的时代 悲剧的人生 (9)

——吴梅村政治生涯与文学道路论略

第一章 家世渊源与早期政治进取 (15)

第一节 吴梅村家世及与复社之渊源 (15)

第二节 建策救危与政治斗争 (23)

第二章 从南中赋归到鼎革之际 (36)

第一节 南中赋归 心仍忧国 (36)

第二节 鼎革之际 短暂复出 (44)

第三章 八年遗民 诗坛盟主 (50)

第一节 身处林下 心系故国 (50)

第二节 声名日盛 诗坛盟主 (65)

第四章 命运的悲剧 心灵的创伤 (81)

第一节 盛名累清节 悲吟诉长恨 (81)

第二节 国事身世皆伤情 谱就诗篇总泪痕 (94)

下篇 情韵风致俱胜 典雅华艳动人·····	(109)
——吴梅村诗词、戏曲、文论	
第五章 吴梅村早期诗歌及风格论·····	(111)
第六章 吴梅村“诗史”之什论略·····	(133)
第一节 “诗史”之战争篇·····	(135)
第二节 《圆圆曲》、《楚两生行》与《听女道士 卞玉京弹琴歌》·····	(142)
第三节 《临淮老妓行》与《茸城行》·····	(153)
第四节 梅村“诗史”的纪实性·····	(160)
第七章 吴梅村诗歌艺术论略·····	(166)
第一节 转益多师的诗艺宗尚·····	(166)
第二节 梅村诗歌艺术探讨·····	(173)
第八章 吴梅村词论略·····	(191)
第九章 吴梅村戏曲、文论论略·····	(208)
第一节 梅村戏曲论略·····	(208)
第二节 梅村文学理论论略·····	(216)
参考书目·····	(225)

导 言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力衰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激化。到崇祯时期，朝廷积弊深重难返，统治集团极其腐朽，在农民起义和关外清政权的双重军事打击下，明王朝内外交困。崇祯十七年，已经延续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交织作用下崩溃了。随之，雄据关外，已经立国号、建正朔、称皇帝的清政权乘势南下，逐个击破农民军和南明力量的抵抗，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基本上统一了中国，但此后又起了三藩之乱，直到康熙中期，社会才渐复安定。长达几十年的动荡和残酷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也正是在这个两朝兴亡，世事沧桑的动荡时期，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繁丽竞逐的繁荣兴盛局面。

明末清初出现的这一场文学繁荣，其声势之盛和成就之高，都堪称唐、宋以来的又一次高峰。

晚明文人喜结文社论诗谈艺，互相砥砺，此风沿入清初，所以当时社会上文学风气很盛，文坛上人才济济，名家并出，作品繁富，遍及各体，在诗、词、文、戏曲、小说，乃至文学理论与批评诸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是为声势之盛。

如诗，在这个时期堪当大家之誉的，有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等，其余有诗名者如夏完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冒襄、归庄、杜于皇、方以智、吴嘉纪、屈大均、陈恭尹、龚鼎孳、朱彝尊、侯方域、宋琬、施闰章、尤侗、陈维崧

等，其时诗坛健者风流云涌，不胜尽举。又有虞山、娄东、云间诸诗派以及后来的神韵诗派，各有门户主张，诗风特色，更使诗坛呈现出繁花竞艳的盛观。

又如词，词在明代已经衰落，但到此际重新振作。先是陈子龙与同邑词人创云间词派，开启了词坛复兴的先河；吴伟业又以他的宏才博学加盟词林，开清词之宗风；以后，陈维崧、朱彝尊二人，双峰并峙于清初词苑，后，阳羨、浙西二词派遂成为清初词坛的主流。这个时期倚声填词的名家亦为数不少，如夏完淳、李雯、宋征舆、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尤侗、王士禛、曹贞吉等。清初词坛的兴盛，结束了词在入明以来近三百年的衰颓，开创了上揖两宋的清词中兴新生面。

再如戏曲，戏曲文学在这个时期也出现创作高峰，名家辈出。姑苏李玉和他的同道朱素臣、朱良卿、毕万后、叶时章、丘园等号“苏州派”，“苏州派”剧作家们创作的剧本数量很大，其优秀之作如李玉的“一笠庵四种曲”《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和《千钟禄》、《清忠谱》等，在当时就脍炙人口，处处搬演，影响很大。吴伟业（梅村）于剧作亦有建树，他写了两部杂剧《临春阁》和《通天台》，一部传奇《秣陵春》，都是感慨身世，暗寓兴亡，有所寄托之作。此际戏曲名家还有李渔，其剧作“笠翁十种曲”，成就也可称道。这个时期最杰出的戏曲文学家是两位年辈稍晚的作者——“南洪北孔”，康熙中期，钱塘洪升推出传奇《长生殿》，曲阜孔尚任推出传奇《桃花扇》，这两部传奇的问世，使明末清初戏曲之盛达到了最高峰。

再说小说，白话话本小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创作和刊刻的热潮。自明末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问世之后，拟话本的仿效之作纷纷推出，多达数十种，形成一时风气，甚至还出现这类小说的选本，如著名的《今古奇观》。白话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呈繁荣态势，出现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个时期的白话小说盛行，多数带有较重的商业意味，因此，此际小说的繁荣从一定意义上说还具有一个新的价值走向，这就是文学的通俗化

和市场化，这一点，虽然于宋、元时代已有存在，但只是到了这时候才形成了一次高潮，这当然是此时城市商品经济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市民阶层的壮大所决定的。

散文，于此际亦颇可观。传统文人向来是诗文并道，诗坛健将往往同时也是文章大家，前所列举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冒襄、侯方域、王士禛等，还有张岱、魏禧等，都是一时的文坛俊彦。

文学理论与批评，在这个时期同样是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在诗论、文论、词论、剧论、曲论、小说和戏曲评点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此际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诗学著述。吴伟业于此道也有所论见。

明末清初的文学繁荣不仅表现在声势之盛上，它还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学发展的历史地位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谈，一是反映了时代现实和时代精神；二是艺术上的高度成功，尤其是这个时期的诗、词和戏曲文学的辉煌成就代表了清诗、清词、清代戏曲文学的最高水平；三是对清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文学积极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现实和时代精神。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内艰外困，民生疾苦，社会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特别是进入崇祯年后，明清战争的局势，明朝已显居下风。此时，明朝在关外只剩锦州、宁远等几座孤城，而清方一面加紧对宁锦关门的军事压力，一面攻袭九边，数次破长城入侵大掠河北、山东，甚至兵临京师城下，屡挫明军。面对清兵日益咄咄逼人的威胁和内地日益败坏的军政局势，有识之士已感觉到危机四伏的预兆，在他们的作品中便饱含着忧国忧民之情感，如陈子龙、吴伟业都有忧虑边事、感念时局的诗作，而吴伟业早期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内容就是咏写忧虑边事、感念时局这一主题，如有关巨鹿之战的系列诗篇：《临江参军》、《读杨参军悲钜鹿诗》、《怀杨机部军前》，以及《云中将》、《边思》、《墙子路》、《高丽行》等诗，陈子龙则还有反映民生疾苦，同情人民苦难的诗作。

甲申之变以后，清朝入主中原。明清的易代，存在着一个民族对抗的问题，在清朝定鼎初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军事征服，南北方人民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顽强抵抗。在这个时期里，抗清复国和故国之思是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当时文坛的主旋律。投身抗战，以身殉国的陈子龙、夏完淳等人投入过复国活动，失败后坚持气节，始终对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屈大均等人的诗文作品就是这样一个主旋律。就连曾签名降表，丧失气节的钱谦益，他在后期也曾投身过复国活动，他的晚年之作《投笔集》，也是高唱着这一主旋律。而避开高唱复国的慷慨，婉抒缅怀故国的哀思，这一主题则有着更广泛的基础和更久远的生命，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等这些曾或先或后或长或短出仕过清朝者，甚至连一早就投降清朝，在清官位显赫的龚鼎孳，以及年辈已晚，与明朝已无君臣之义的王士禛、洪升、孔尚任等人，在他们的诗、词、戏曲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晦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清朝统治者在初定中原尤其是在征服江南和此后的一个时期里，实施了野蛮的军事杀掠和暴虐的高压政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反映这一社会现实，并由此表示出对清朝征服者的敌视和反感，是那些以身殉国的英烈诗人和坚持气节的遗民诗人作品中又一个重要主题。而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等人也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给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增添了更多的亮色。

这个时期的文学，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于诗而言，陈子龙向来被认为是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吴伟业（梅村）称他“负旷世逸才”，“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①。王士禛论诗，以为子龙的七言律诗“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

^① 吴伟业：《梅村诗话》。

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① 钱谦益才宏学博，诗歌艺术尤为纯熟，其诗能为雄伟、奇诡、温婉、艳丽等多种风格，可见他的才情与技巧之高，从艺术上讲，钱谦益实在是无愧于大家之誉的。尤其是他的《投笔集》“秋兴”、“后秋兴”组诗次杜甫《秋兴八首》韵，前后连赋一十三叠一百零八首，沉郁苍凉，情真辞丽，艺术造诣很高。陈寅恪先生曾高度评价道：“《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又道：“《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② 钱仲联先生则提出：“牧斋七律，为清代第一。”^③ 吴伟业的诗名与艺术成就与陈子龙、钱谦益为伯仲之间，前文已引王士禛的评语，谓陈、吴二人的七言律诗是“一时瑜、亮”，都是“冠古之才”，牧斋则与梅村相继领袖诗坛，世称“钱、吴”。梅村最擅胜的是歌行体，佳制累累，如《洛阳行》、《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琵琶行》、《萧史青门曲》等，当时就众口传颂，一向为论者所激赏，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梅村）歌行一体，尤所擅长……一时尤称绝调，其流播词林，仰邀睿赏，非偶然也。”继钱、吴之后主盟诗坛的是王士禛。王士禛标举“神韵”，他的诗作风神俊秀，韵味深永，开一代风气。陈、钱、吴、王俱是诗人中第一流的人物。陈子龙实际上是明代最杰出的一位诗人，赵翼曾有议论道：“通计明代诗，至末造而精华始发越。陈卧子沉雄瑰丽，实未易才。”^④ 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亦俱是一时不易之才，梅村、渔洋还被尊为“清诗开国宗匠”。他们开创了清诗中兴的新局面，而他们的诗歌艺术成就也代表了清诗的最高水平。

就词而言，其时词坛的几位主将词艺功力深厚，各有所长，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

②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五章。

③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

④ 赵翼：《瓯北诗话》。

陈子龙词宗婉约，词风近温飞卿、李后主、秦淮海、李易安。吴伟业词，则“兼有周、柳、苏、辛之长。”^①其词婉约者清丽，苍劲者悲凉，其词如其诗，多寓身世之慨，河山之叹，发于真情，特具风韵，推崇为清词冠冕，是属可当之誉。陈维崧是阳羨派主将，词学苏、辛，以雄豪之奇，显出他的过人才气。朱彝尊是浙西派宗匠，词宗姜、张，以醇雅清空为正，重格律精工，表现出他的词学功力。清词在这几位大师的努力下，一入手就直摩两宋，使清词在艺术上达到圆熟的高度。

就戏曲而言，苏州派剧作当行本色，适于舞台搬演。吴伟业的戏曲作品，亦如同他的诗、词一样，深寓身世之感，抒其兴亡之叹，又富于文采，所以也颇受盛誉，如王士禛赞美梅村的杂剧《通天台》道：“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②吴江徐虹亭更为推崇备至，称扬梅村的《秣陵春》、《通天台》“直夺汤临川之座”。^③可见梅村剧作在清人心目中的崇隆地位。至于洪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则是古典戏曲作品的绝响，后来再没有人能够企及。

明末清初时期的散文、小说成就则逊于诗、词、戏曲。散文的几位名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的文章多属于学术、政论范畴，张岱的小品，继承晚明公安、竟陵一派的风格，抒写性灵，侯方域、魏禧等人的古文，学唐、宋古文大家的气格，艺术上也都有可称道之处。吴伟业的散文多序记文字，文中喜好参用俚偶，富于文采，成就不及他的诗、词、曲，遂不以文名世，其实他的散文，艺术上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小说则只有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后传》为寄情抒愤之作，有所成就，其余大量充斥于世的白话长、短篇小说，商业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而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其成书问世已是康熙后期，以

① 程穆衡：《吴梅村先生诗余序》。

②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

③ 徐虹亭：《词苑丛谈》。

时代言，已不属明清之际。

明末清初时期的文学，对清代文学具有较深影响的，端在诗、词。这个时期的诗摒弃了晚明以来七子派的模拟、公安派的率易、竟陵派的幽僻等诸种流弊，虽然仍有宗唐、宗宋的争论，但已不再拘守于尺寸不敢逾越的模拟，学习前人也由独宗一派而转向转益多师，从而拓宽天地，自铸伟辞，开启清代诗风新格局。明末清初诗风的转变，对于清诗的兴盛和取得超越明诗，上揖三唐、两宋的艺术成就，有着深远的影响。词则是起溺振衰，重开生面，这个时期词坛的繁荣，为清词取得词史上的中兴地位，构建了辉煌的开端，陈子龙、吴伟业则是开辟一代宗风的先驱者，后来朱彝尊始创的浙派，主盟清代词坛一百余年，绵延久长，而浙派所主的以南宋为宗，以醇雅为正的词学观，则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清词。

我们在上面对明末清初时期的文学盛况作了一番大略的梳理，显然，吴伟业是这个时期极其重要的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然而，清代论者拘于政治上的避忌和囿于资料的遗缺，致使对梅村所作的评价有所失当，其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梅村早期诗风的评论，而由此而来的看法，长期以来，乃形成传统的定评，揆其原由，盖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故吴梅村之研究尚待深入。今日，吴伟业作品的全璧，已搜集校订梓行于世，对三百六十年前的兴亡沧桑，我们也可以予以历史的考察研究。因而笔者试图结合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就吴伟业的人生历程、其政治、命运、心灵之悲剧与他的文学道路、文学成就及文学史的地位展开一番知人论世的探讨。

上 篇

悲剧的时代 悲剧的人生

——吴梅村政治生涯与文学道路论略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以其号梅村著名于世，又有梅村居士、梅村道士、梅村叟、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旧史氏、外史氏、国史氏等别号。江南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

梅村之世，正是明清兴亡的大动荡时代。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州首领努尔哈赤自称大汗，建号立国，史称“后金”。两年后，后金以“七大恨”誓师，攻占抚顺，从此揭开长达四十余年明清战争的序幕，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袭击抚顺，至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吴三桂俘获永历帝南明灭亡，明清战争打了四十四年。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对后金的萨尔浒战役中大败，丧师数万，从此明朝在辽东战场，攻守易位。又两年后，明军丧失沈阳、辽阳，辽东土地几乎丢光，建州奴隶主后金（清）军事政权遂成为明朝的强大敌手。此后，自崇祯二年起，清兵先后六次破长城，攻掠内地，其中两次兵临北京。明朝在辽东战场节节失败，尤其是崇祯十五年，明督师洪承畴兵败松山，丧失精锐军队十几万，明朝自此役失败，军事力量元气丧尽，此后对清战守完全处于劣势，既再也没有力量谈复辽之事，也没有足够的军力对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松山大战实是明清兴亡之决定性战役。

自从辽东起了战争，不断增长的军费使明朝的财政负担大大加重，于是为辽事增加了特别赋税，谓之“辽饷”，而“辽饷”也随着战争的扩大逐年增加，这就使明朝政府更加重了对内地人民的剥削、搜刮，加上吏治腐败，贪官横行，终于在崇祯元年爆发了陕西农民起义。明朝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军，调集军队大肆征剿，又增加了一笔军费，谓之“剿饷”，这笔开支自然还要转嫁到人民头上，于是，更多的农民不堪困苦，奋而投入起义军，起义遂演成燎原之势。这样，边关清兵步步进逼，中原起义遍地

烽火，两因互动，明朝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而这个时期的明朝政府正一步步更深地走向混乱腐朽的深渊。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一个不如一个。万历荒殆朝政，朝廷中外上下矛盾日益尖锐，大明王朝即从万历后期开始走向衰败之路。因为万历帝宠爱郑贵妃，贵妃福王母子遂有了夺嫡的态势，于是诸臣“争国本”，保太子，廷争激烈，“挺击”疑案扑朔迷离，弄得朝廷中外汹汹，后来总算万历帝依从了诸臣的劝谏，没有换太子，但是已种下了后来弘光朝党争的祸根。泰昌帝好不容易保住了太子地位，可他即位做了仅仅一个多月的皇帝，就留下一个“红丸”疑案，“龙驭上宾”，呜乎哀哉。天启皇帝继位时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此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管理国家的兴趣，却喜爱木工手艺，镇日里在宫中耍弄木匠把式，把国家大事交给了宦官魏忠贤。魏忠贤趁机弄权，于宫中内结天启乳母客氏，于朝廷上培植私党，任意胡为，一时间阉党凶焰薰天，正人君子惨遭打击、迫害、杀戮，弄得冤狱遍于国中，一片乌烟瘴气。天启朝短短七年，大大斫丧了明朝的元气。到了崇祯时代，明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已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崇祯帝倒是想有所振作，他一即位就惩治了魏忠贤阉党，任用袁崇焕经略辽东，对清战争态势稍有起色。但崇祯刚愎自用，轻躁多疑，十七年间频频换相，任用更换宰相达五十余人，特别在军事战略上举措屡屡失机，先是冤杀袁崇焕，后来洪承畴、孙传庭丧师失地，崇祯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终于只好跑到煤山上去自尽，成为亡国之君。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摧枯拉朽的破竹之势，一举攻下北京，明朝中央政府宣告覆灭。接着，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又以席卷之势迅速攻占大半个中国。清军南下，江南民众的抵抗最为英勇，江南知识分子的反抗也最为激烈，而清朝政府对江南民众和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最为残酷，从初下江南时的军事屠杀，到后来的案狱究治，使江南人民和不肯屈服、不肯合作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危疑恐怖之中。

明清易代，中国社会动荡战乱长达数十年，那是一个充满了